

天生好教師的有害性迷思—雖有幾十年的證據，好的教學仍然被認為是藝術而不是科學，這對教職員工和學生都造成了傷害（二）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在《業餘時刻：美國大學教學史》The Amateur Hour: A History of College Teaching in America（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在 2020 年出版）中，作者喬納森·齊默曼（Jonathan Zimmerman）從大學檔案中挖掘出數十年的資料，其中包含有大學如何將良好的教學視為個人因素，取決於能力而不是訓練—正如普林斯頓有一位院長在 1950 年時曾寫下過：這是「上帝賜予」的才能的綜合。

儘管近幾十年來這些浮文巧語發生了一些變化，賓夕弗尼亞大學教育史教授齊默曼（Zimmerman）指出了一個明顯的悖論：儘管大學變得更加官僚化和中央集權，教學仍很大程度上獨立於監督系統外。其中部分原因與學術自由的概念有關。教授們認為，他們應該能自行控制不僅僅是教學的內容更包含教學的方式。

齊默曼和其他一些人都注意到：大眾並不確定這樣的方式是否正確。在過去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出現了一波書籍和專欄文章，譴責一些學生在大學期間學得少得可憐，並質疑學位的價值。隨著大眾不信任的增加，價值觀的明顯差異也在增大：大學將自己視為知識和學術的創造者，一個正常運作並且有著影響力的「有聲譽的經濟體」。大眾們則認為它們最重要的功能是教學。

俄亥俄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科學教授史蒂芬·加瓦齊（Stephen Gavazzi）和西維吉尼亞大學校長 E. 戈登·吉（E. Gordon Gee）為他們的新書 What's Public About Public Higher Ed?（霍普金斯大學）對近 6000 人進行了關於他們對大學的看法的調查。其中有一思考練習題是問他們如何將 100 元的公共資金用於高等教育。受訪者普遍表示，他們會將其中大約一半用於教學，而剩下的則是各 25 元分配給研究和設施。

加瓦齊對非營利新聞機構 Open Campus 說：「這顯示出大學在如何定位自己這件事上的矛盾之處。」

但最近，人口統計和數據正逐漸推翻這個神話。隨著第一代（所謂的第一代大學生泛指父母沒有接受大學教育之大學生）和低收入學生入學人數的增加，有效教學已經成為大學間競爭以及其承諾的有教無類的關鍵。那些跟不上學習掙扎著的學生不能再因「你不是當大學生的料」這樣的說法而被打發離開。設計不好或教得不好的課程可能會更加地傷害到那些弱勢背景的學生們。這在學生決定科系—或甚至決定是否想繼續留在大學裡—的入門課程中最為明顯。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化學教授大衛·勞德（David Laude）是全美校園中宣揚教學改革重要性的眾多推動者之一。

勞德於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教書，他說他落入了一個思想上的陷阱，認為他在入門基礎課程中的職責就是淘汰那些不屬於這裡的人。畢竟，這是他自己在學生時期所經歷過的。所以他按照曲線圖來評分，據他估計，這些年來他的學生中大約有 20% 的人被他當掉。他說：「我的期望是聰明的孩子會得到 A，其他人會得到 C 和 D…我不是不在乎學生，但是我沒有把他們視為單獨的個體。」

勞德多次談到他的教學轉變，那是在他擔任了一個負責提升畢業率的行政職位並開始看到那些在他的課堂上墊底掙扎的學生之後發生的事。他們通常是低收入學生和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他如今自問：「一直以來我怎會如此的無知？」

他看到了自己早期的失誤與教職員工如何被這大環境同化這兩者之間的關聯。簡而言之，他們仍然接受培訓，但這是教他們成為教授課程內容的老師，而不是學生的老師。勞德說：「如果我被要求的只是站在學生面前，就某個主題發表精彩的演講，然後合上書離開，那麼對於課堂上或許有學生有疑問或者沒聽懂這樣的狀況，我甚麼事也沒做。」

勞德的轉變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自己說到）他不再認為自己是一名老師，而是一個引導和激勵學生的人。他在德州大學重新組織入門基礎課程並且為那些有被當風險的學生設計預防措施。這樣的舉動使得該大學大幅提高了「四年畢業率」。

其他的教學推動者也分享了類似的故事。像勞德一樣，他們也在

課堂上有所領悟。然後，他們花了多年的時間認真考慮教師的角色並重新定義他們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他們通常勇往直前無視於同事的警告——在教學上花費太多時間對於晉升和終身教職審查沒有任何幫助。

這些教學改革者說，要改變這種思考方式，你必須改變整個生態系統。這是個艱難的工作。它意味著改革研究所教育。它意味著必須選擇關心畢業率和縮小公平教育差距的負責人，就像勞德和他的同事在德州大學所做的那樣。

這也意味著將培訓和獎勵機制納入學術結構。教職員工可以學習新的教學方式，而不會覺得這方面的付出是無形的，或者要犧牲像學術研究這類對他們來說有價值的東西為代價。

對研究的過份強調和對教師的培訓忽視並不是 STEM 獨有的（STEM 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將技術和工程學併入常規課程，創造一種「元學科」，並以此對數學、科學等學科的教學進行革新）。

多年來，阿肯色大學費耶特維分校（University of Arkansas at Fayetteville）的英語副教授莉賽特·羅培茲·斯維德基（Lissette Lopez Szwydky）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她說，人文學科教授傾向於將教學視為一種職業。與 STEM 教授相比之下，他們比較不會陷入「淘汰」的思考模式。例如，新生作文是許多學校的標準入門課程之一，以小組形式教學，重點是讓學生能在大學獲得成功而做準備。

她說：「人文學科是一個重要的教學空間，創新正在萌芽。」問題在於，在制度層面，它很少受到鼓勵或獎勵。

而令斯維德基（Szwydky）驚訝的是，在她擔任大學行政人員時（在成為教授之前），每週要花二到四個小時在專業的發展上。這是被列入工作內容中的。相比之下，她成為教職員之後的訓練「全都是自我指導、自我引導、做我想做的事。而這些從不算在我年度評估之中。」

她說，無論你獲得了多少教學獎項都無關緊要。「假使你的學校優先考慮的是研究，那麼研究才是決定你的終身教職檔案的成敗所在。」

學校還在持續努力判斷該如何評價教學方面的研究。對那些以學

科為基礎的教育研究感興趣的教授，例如學生是如何學到「化學是甚麼？」或是「化學是如何運作的？」，經常抱怨他的研究被認為不如其他的學術研究嚴謹。斯維德基說：「在大多數注重研究的大學，如果你在教育學期刊上發表文章，這些文章的分量遠不如那些發表在傳統期刊上的文章。」

那麼你該如何改變教學文化呢？

撰稿人/譯稿人：Beth McMurtrie / 翁而真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1.10.20) The Damaging Myth of the Natural Teacher---Despite decades of evidence, good teaching is still considered more art than science. That's hurt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alik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damaging-myth-of-the-natural-teacher>

